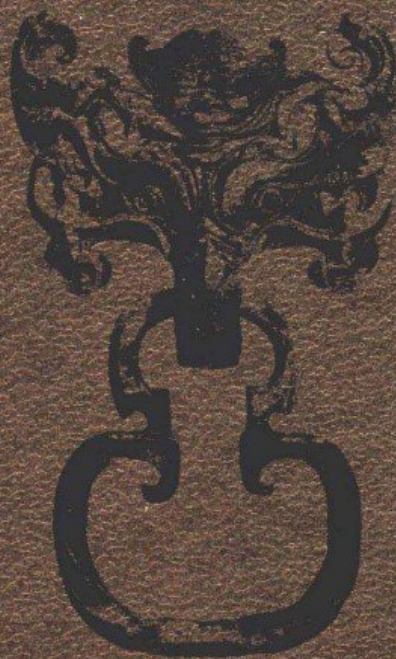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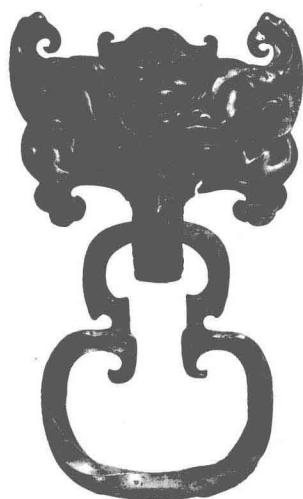


金銀器玻璃器 ①



中國美術全集

金銀器玻璃器一



☆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國美術全集·金銀器玻璃器 / 金維諾總主編; 齊東方卷主編.
—合肥: 黃山書社, 2010.6

ISBN 978-7-5461-1362-3

I. ①中… II. ①金… ②齊… III. ①美術—作品綜合集—中國—古代
②金銀器 (考古)—中國—圖集 ③玻璃器皿—中國—古代—圖集
IV. ①J121 ②K876.432 ③K876.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0) 第111984號

中國美術全集·金銀器玻璃器

總主編: 金維諾
責任編輯: 宋啓發

卷主編: 齊東方
封面設計: 蠶魚閣

責任印製: 李曉明
責任校對: 汪國梁

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黃山書社(<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1118號出版傳媒廣場7層 郵編: 230071 電話: 3533762)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89×1194 1/16 印張: 33.5 字數: 110千字 圖片: 815幅

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461-1362-3

定價: 1200圓 (全二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本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及時向承印廠調換)

《中國美術全集》編纂委員會

總顧問 季羨林

顧問委員會 啓功 (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俞偉超 (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教授)

王世襄 (原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楊仁愷 (原遼寧省博物館研究員)

史樹青 (原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宿白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傅熹年 (中國工程院院士)

李學勤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原所長、研究員)

耿寶昌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孫機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田黎明 (中國國家畫院副院長、教授)

樊錦詩 (敦煌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總主編 金維諾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副總主編 孫華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羅世平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邢軍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藝術總監 牛昕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美術編審)

《金銀器玻璃器》卷主編 齊東方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中國美術全集》出版編輯委員會

主 任 王亞非

副 主 任 田海明 林清發

編 委 (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亞非 田海明 左克誠 申少君 包雲鳩 李桂開 李曉明

宋啓發 沈 傑 林清發 段國強 趙國華 劉 煒 歐洪斌

韓 進 羅銳韜

執行編委 左克誠 宋啓發

項目策劃 羅銳韜 沈 傑

封面設計 蠹魚閣

品質監製 李曉明 歐洪斌

凡 例

一、編 排

1. 本書所選作品範圍為中國人創作的、反映中國文化的美術品，也收錄了少量外國人創作的，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美術品，如唐代外來金銀器、清代傳教士郎世寧的繪畫作品等。

2. 根據美術品的表現形式和質地，共分為二十餘類，合為卷軸畫、殿堂壁畫、墓室壁畫、石窟寺壁畫、畫像石畫像磚、年畫、岩畫版畫、竹木骨牙角雕琺瑯器、石窟寺雕塑、宗教雕塑、墓葬及其他雕塑、書法、篆刻、青銅器、陶瓷器、漆器家具、玉器、金銀器玻璃器、紡織品、建築等二十卷，五十冊。另有總目錄一冊。

3. 各卷前均有綜述性的序言，使讀者對相應類別美術品的起源、發展、鼎盛和衰落過程有一個較為全面、宏觀的瞭解。

4. 作品按時代先後排列。卷軸畫、書法和篆刻卷中的署名作品，按作者生年先後排列，佚名的一律置于同時期署名作品之後。摹本所放位置隨原作時間。

5. 一些作品可以歸屬不同的分類，需要根據其特點、規模等情況有所取捨和側重，一般不重複收錄。如雕塑卷中不收錄玉器、金銀器、瓷器。當然，青銅器、陶器中有少數作品，歷來被視為古代雕塑中的精品（如青銅器中的象尊、陶器中的人形罐等），則酌予兼收。

6. 為便于讀者瞭解大型美術品的全貌，墓室壁畫、紡織品等類別中部分作品增加了反映全貌或局部的示意圖。

二、時間問題

7. 所選美術品的時間跨度為新石器時代至公元1911年清王朝滅亡（建築類適當下延）。

8. 遼、北宋、西夏、金、南宋等幾個政權的存在時間有相互重疊的情況，排列順序依各政權建國時間的先後。

9. 新疆、西藏、雲南等邊疆地區的美術品，不能確知所屬王朝的（如新疆早期石窟寺），以公元紀年表示，可以確知其所屬王朝（如麴氏高昌、回鶻高昌、南詔國、大理國、高句麗、渤海國等）的，則將其列入相應的時間段中。

10. 對於存在時間很短的過渡性政權，如新莽、南明、太平天國等，其間產生的作品亦列入相應的時間段中，政權名作為作品時間注明。

11. 某些政權（如先周、蒙古汗國、後金等）建國前的本民族作品，則按時間先

後置于所立國作品序列中，如蒙古汗國的美術品放在元朝。

三、圖版說明

12.文字采用規範的繁體字。

13.對所選美術作品一般祇作客觀性的介紹，不作主觀性較強的評述。

14.所介紹內容包括所屬年代、外觀尺寸、形制特徵、內容簡介、現藏地等項，出土的作品儘量注明出土地點。由于資料缺乏或難以考索，部分作品的上述各項無法全部注明，則暫付闕如，以待知者。

四、目錄及附錄

15.爲了方便讀者查閱，目錄與索引合并排印，在每一行中依次提供頁碼、作品名稱、所屬時間、出土發現地/作者、現藏地等信息。

16.爲體現美術作品發展的時空概念，每卷附有時代年表，個別卷附有分布圖，如石窟寺分布圖、墓室壁畫分布圖等。

五、其 他

17.古代地名一般附注對應的當代地名。當代地名的錄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2008年底全國縣級以上行政區劃爲依據。

18.古代作者生卒年、籍貫、履歷等情況，或有不同的說法，本書擇善而從，不作考辨。

中國美術全集總目

總目錄

卷軸畫

石窟寺壁畫

殿堂壁畫

墓室壁畫

岩畫 版畫

年畫

畫像石 畫像磚

書法

篆刻

石窟寺雕塑

宗教雕塑

墓葬及其他雕塑

青銅器

陶瓷器

玉器

漆器 家具

金銀器 玻璃器

竹木骨牙角雕 琺琅器

紡織品

建築

中國古代金銀器概述

古代金銀器的發現相對其他遺物要少，但在其輝煌燦爛的歷史傳承中，與高貴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人類社會中始終如一地代表着上層社會的文化面貌。遺物的珍貴和所反映的多層面的象徵意義，如同本身的材質一樣，具有永恒的歷史研究價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金銀的特殊性在于，商人把它看作是價值尺度，藝匠把它作為精美藝術品的材料，普通的人也或多或少地與之發生聯繫。金銀器常常超越了器物自身的實用性，由物質領域凸顯于精神層面，影響之深，甚至波及到中國語言詞彙的使用，如形容永不失效的承諾為“金口玉言”，不可改變的原則稱“金科玉律”，時間寶貴稱“一刻千金”，文章精煉和改文章精彩叫“惜墨如金”、“點石成金”，稱聰明漂亮的男孩是“金童”，出身高貴的女孩為“金枝”，豪華而腐朽的生活是“紙醉金迷”，人由壞向好的轉變稱作“浪子回頭金不換”等等。不僅如此，金銀還在社會生活中起到奇妙的作用，在古代承載了貨幣、賦稅、賞賜、貢奉、贈送、施捨、懸賞、賄賂、賭博等多種功能，從一定意義上說，金銀直接參預了豐富多彩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生活，潛移默化地改變着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方式。

黃金、白銀具有久不變質、易于分割、延展性強的特性。由于金銀材料的這種獨特優勢，人們願意在金銀工藝上傾注熱情和智慧，發揮自己聰明才智和豐富想象，極力創造出精細和靈巧的作品。極其高貴的審美價值使金銀幾乎在每個文化中都處於理想的、完全超經驗主義的神奇境界。

中國古代金銀器大的時代劃分，可分為早期金銀器（南北朝以前）、隋唐五代、宋以後三個發展時期，每個時期還有階段性變化和區域性特點。

黃金性能穩定，在自然界中多以游離態存在，可以直接獲得。銀在自然界是以化合物形式存在，需要掌握提煉技術，故出現比金要晚。但自然界中銀的儲存量大于黃金，一旦其提煉技術為人們掌握，銀器就大大地流行起來，用銀的數量遠遠超過黃金。

在古代遺物中，黃金首先是作為實用器物的裝飾出現在陶器上。河南湯陰龍山文化遺址^①出土的含金砂陶片，被推測是有意把金砂摻入陶土內以起到裝飾作用。稍晚一些相當于夏代的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②，出土了金環、銀環，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金銀首飾，表明早在史前社會，人們已對金銀有了一定的認識和利用。此後，金銀被用于裝飾的現象越來越多。

商代黃金飾物不再稀罕，出土地點也超出了商王朝的勢力範圍。河南鄭州二里崗、安陽殷墟、輝縣市琉璃閣，河北藁城臺西，北京平谷區劉家河，山東益都蘇埠屯，山西保德、石樓蘭家溝及永和下辛角村的商代墓葬，以及四川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村遺址中都出土了金箔、金片、金葉、金絲，這些遺物原本裝飾在其他器物上，也有獨立使用的，如金臂釧、金笄和金耳環等。

屢屢發現的商代實物，足以表明當時人們已經把黃金作為極其珍貴的物品。安陽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金片厚僅 0.01 ± 0.001 毫米，加工經過退火處理^③。四川三星堆祭祀坑的長124、直徑2.3厘米的杖，用純金皮捲製，刻人物、鳥、魚等圖案。成都金沙村的金帶將鳥、魚、箭作為主要構圖元素。紋飾內容的同一性，反映了金沙村遺址與三星堆遺址具有密切的傳承關係。金沙村的金四鳥繞日飾件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圍繞太陽旋轉的四隻鳥也許表現了對太陽神的崇拜。金面罩類的人面像在其他地區幾乎不見。兩遺址的金器製作採用了錘鑠、剪切、刻劃等多種手法，是當時金器工藝的代表之作，可知當時的先民對黃金的性能已經熟悉。北京平谷區劉家河商代中期墓葬經過測試的金器，含金在85%，原料也許採集於自然界。

商代的金製品大多發現於大墓中。出土於椁室底部的，或許是棺槨上粘附的裝飾；見於車馬坑和馬坑的，為車馬的飾品；漆器所飾的金箔，祇是為了襯映漆器的華美；至於同綠松石一起出土的，應是某些器物上的飾物，還有包金的銅泡。總之是把黃金箔片精心地裝飾在青銅禮器、玉器、漆器和車馬器具上，也用來做首飾及服飾，似乎祇有貴族才能享用。但也有貴族大墓未發現金製品，安陽殷墟發掘的婦好墓^④是保存最完整、陪葬品最豐富的王室墓，隨葬品一千九百二十八件，就未見有金製品。殷墟郭家莊160號墓^⑤也是一座保存完整的高級貴族墓，隨葬品三百五十三件，同樣未見金製品。而南方成都地區發現的金製品，種類、造型、紋樣遠比中原豐富。不難看出，黃金在剛剛走進人們生活之中時，尚未體現更多的文化意義，也沒受到普遍重視。

西周時期繼續用金箔類裝飾器物，不過金片類裝飾趨於大型化。甘肅禮縣大堡子山西周晚期秦人墓的金飾片，按形制和紋樣區分，有重環紋、虎形、鴟梟形、口唇紋鱗形、雲紋圭形、獸面紋盾形、目雲紋竊曲形，這些金飾片可能為秦仲或莊公內棺上的裝飾^⑥。飾片的成型和紋樣採用了高超的錘鑠技術，紋路清晰，凹凸起伏，猶如青銅器鑄造出的紋樣。金虎和鴟梟的口、眼清晰，手法簡潔，形象生動。河南三門峽虢國墓中還見到了圓環形、獸首形、三角形金飾件。這些金器為澆鑄成型，紋樣精緻，採用了鏤空工藝。

鑄造飾件的出現標志著西周金飾工藝的進步。金腰帶飾的組件是西周金製品中

的珍品，多鑄出精細的花紋，可見熔金鑄器業已成熟，形制紋樣和製作技術與青銅器無大區別。這些器件作為帶飾使用，貴重豪華，是死者身份地位的象徵，佩繫這些黃金鑄造飾件的人應是高級貴族。這種金質帶飾，在以後的朝代中演變成爲等級身份的標志性服飾，沿用了數千年。

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已經充分意識到黃金不僅色彩絢麗，光亮照人，還有不易生鏽和耐久的特性，因此得到較爲廣泛的利用。白銀製造的器物在戰國時期也較多出現，從而使金銀器製造又上一個新的臺階。其標志是，製作較複雜精細器物的能力大大提高，出現了金銀器皿類的大型容器，并與多種工藝相結合，還出現了金銀錯、鎏金等裝飾工藝。

陝西寶雞益門村2號春秋晚期墓中出土金器一百零四件^⑦，主要是兵器、裝飾品及馬具，品種包括帶鉤、帶扣、環、圓泡、方泡、絡飾等裝飾品，劍柄、刀柄等兵器，總重量約3000餘克。帶扣不僅裝飾華麗的紋樣，還採用了透雕式的鑄造工藝。金劍柄更爲精緻，通體爲細密的蟠螭紋，顯示出熔金鑄器十分成熟，有的可能運用當時銅器製作中的失臘法澆鑄。北方地區的內蒙古準格爾旗西溝畔和杭錦旗阿魯柴登等遺址中的金牌飾，運用鑄造、錘鑠、焊接、鏤空技術，出現了具有浮雕、圓雕等藝術效果的器物。

白銀出現略晚于黃金，戰國時期河南扶溝縣古城村的鏹形銀幣、河南省輝縣市固圍村的銀帶鉤、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遺址出土的銀飾件是較早器物。稍後還製作出銀匱、銀帶鉤、銀俑燈、銀圓飾等。白銀一登上歷史舞臺，便很快與黃金平分秋色，而且逐漸盛行。

金銀容器的出現是劃時代的標志。湖北隨州戰國時代的曾侯乙墓出土有盞、杯和器蓋，是已知最早的金質器皿。金盞高10.7厘米，口徑15.1厘米，重2150克。這些器皿鑄造成型，形制和製造方法基本與當時的青銅器相同。金的熔點爲1064.43℃，在液態情況下流動性較好，冷凝時間也較長，故澆鑄溫度可略低于銅等金屬。曾侯乙墓的金盞形體大，花紋精細而複雜，表明當時具有製作大型器皿的能力。銀製器皿似乎與金製器皿同時出現。山東淄博臨淄西漢齊王墓隨葬坑^⑧中出土三件銀盤，一件銀盤口徑37厘米，重1705克，盤口沿底面刻銘採用了三晉布錢的計值單位，可知銀盤爲戰國時代所製，秦滅三晉後銀盤歸秦，漢滅秦後又歸漢，并賜予齊國，故出土于西漢齊王墓的隨葬坑中。

金銀與多種工藝的結合也在春秋戰國時流行。金銀錯是在銅器鑄造時預留的凹槽內鑲嵌金銀絲、片，形成圖案或文字，再經磨錯，與器表光平一致，色彩絢麗，華美異常。這種工藝源于商代銅器上的錯紅銅^⑨，平山中山王墓有大量金銀錯銅器。

鑒金工藝也開始興盛，浙江紹興306號戰國初期墓^⑩出土的一件“鑒金嵌玉扣飾”，是採用鑒金技術製作的實物之一。鑒金是以金粉末與水銀生成汞劑，塗于銅器或其它器物的表面，待水銀蒸發後，金附于器表。戰國時青銅鑒金十分流行，山西長治分水嶺戰國墓中出土的鑒金銅車馬飾、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出土的鑒金銅帶鉤^⑪等，均為高超的鑒金工藝精品，顯示出戰國時期鑒金工藝已是常用的技術。

戰國時期黃金、白銀也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以及貯藏的作用。北方地區常見銅貝包金。黃金、白銀也直接用于製造貨幣，楚國境內使用金幣“郢爰”、“陳爰”。浙江紹興306號戰國初期墓還出土有金餅、小金片，可能是兩種不同形態的貨幣^⑫。據《管子·乘馬篇》記載的“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 黃金百鎰為一篋”^⑬，可知黃金與其他物品的比值已出現。

經測試，戰國時期的“郢爰”含金量不等，為70%–90%。曾侯乙墓出土的黃金製品作過成分的檢測，含金在85.66–92%之間，其他為銀、銅等。可以看出，自商、西周以來，金銀製品中所含的雜質較多，說明當時冶煉技術還不够精細穩定。

春秋戰國時期金銀器數量比前代增加，與比較充足的原料來源有關。《管子·地數》說：“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⑭表明對各種礦物的地質學知識有了具體認識，金屬礦產埋藏的地貌和共生關係也為人們有所瞭解。這種有關獲取諸種金屬的記錄，是當時人們采礦知識的積累和利用礦床中礦物的共生組合找礦方法的結晶^⑮。《山海經》中提到許多產金、銀的地區，包括今河南、湖北和山西、陝西南部，四川、湖南和江西北部，以及山東和甘肅少量地區。比較明確的重要黃金產地是楚國領地，《韓非子·內儲說》上篇云：“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戰國策》記載楚懷王說：“黃金、珠、璣、犀、象出于楚，寡人無求于晉國。”^⑯楚國正是由于擁有天然的資源，率先發展起了黃金器物的製作，還在列國中首先使用了黃金的稱量鑄幣——郢爰、陳爰、盧金等，并由國家控制黃金的生產。楚地多金，在考古發現的春秋戰國文物中體現得十分清楚。

春秋戰國金銀物品增多，顯然不會僅僅依靠從自然界中采集原料，當時已經開始較大規模地開采黃金和白銀礦^⑰。金銀器物的社會意義在于新型材料的應用，給人類的物質精神生活帶來新面貌，金銀質地上的可塑性和外觀上的絢麗輝煌，開闊了人們的視野，使富貴身份、顯赫等級地位又有了新的表現形式，使人們利用物質材料來表達精神生活的形式更加豐富。

秦代時間短暫，金銀器使用却較多，特別是車馬裝飾件鑄造得一如銅器，陝西秦始皇陵陪葬坑中出土的1號、2號銅車馬^⑧有數百件金銀飾件，工藝精湛。西漢金銀器製造已脫離了模仿青銅工藝的傳統技術，成為獨立的手工業門類。成熟的掐絲和金粒焊綴及鑲嵌綠松石和水晶等工藝，是當時金銀器製造的重要成就。除了服飾、首飾外，器皿的種類增加，新製造的醫用器具、工具等，進一步擴大了金銀製品在生活中的用途。廣州西漢南越王墓、河北滿城縣西漢劉勝墓、雲南晉寧石寨山西漢墓的金銀器，是西漢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發現。金銀器皿數量增加，種類增多，有盤、匜、碗、盆、盒和小銀壺等，多為當時陶、銅器中常見的造型，還有金竈模型、金縷玉衣、銀縷玉衣、金銀印章、金指環、銀指環、銀手鐲、珠串飾、銀頂針、金耳璫等。

漢代關於金、銀礦藏的方位的知識，以及開采方式、冶煉技術、金銀成色掌握、器物製作工藝等方面，都出現新變化。《華陽國志》記載涪縣“孱水出孱山，其源出金銀礦，洗取，火融合之為金銀”。在河流中淘出的黃金要加熱融合，是對火法煉金的掌握。漢代方士所說的“丹沙可化為黃金”等，也有用冶煉的方法從礦物中提取黃金和融造合金的意味。隨著黃金冶煉的進步，出現了“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的質量品評，這裏也許是指不同的金屬，但根據實物檢測，在當時用色澤來判定金屬成色的技巧已經被掌握。漢代經測定的馬蹄金等的含金量一般都在95%以上，最高達99.3%。如果沒有較高的冶煉和提純工藝，不可能達到如此高的純度。金銀器製造主要由官府掌控，也有皇親貴戚私家製作。

河北獲鹿西漢墓的銀盤潔白光亮，嶄新程度猶如現代器物，表明當時拋光技術達到很高水平。器物製作中最為突出的是掐絲和焊綴金珠工藝。掐絲，是將錘打得極薄的金銀片，剪成細條，慢慢扭搓成絲。焊綴金珠，是把小段金絲加熱熔聚成粒，或將金絲端頭加熱融化滴落成圓珠，焊綴于物品之上。“金縷玉衣”的金絲加工方法可能是拔製，也有用金片剪下的細條擰成，為合股金絲。

陝西西安市沙坡漢墓出土的金竈模型，四壁、邊緣用金絲和金粒焊綴出紋樣，金絲焊捲出煙囪，竈眼上的釜中堆滿金粒。河北定州市陵頭村東漢中山王劉暢墓出土的龍形金飾片、金辟邪、羊群均為掐絲作品。金羊群最精巧，它是在鑿有流雲紋的金片上粘接四隻站立的小綿羊，羊身上焊綴金粒和鑲嵌綠松石，綿羊僅長1厘米，高0.8厘米，巧奪天工，精美絕倫，反映了當時對金質材料特性的深刻認識，並能充分利用其延展性能良好的優點，創造出精細複雜的作品。

鍍金工藝的作品在西漢仍舊大量發現，稱“金塗”、“黃塗”。陝西興平縣漢武帝茂陵出土的高62、長76厘米的鍍金銅馬，滿城劉勝墓中鍍金銅器長信宮燈等是

這一工藝的代表作品。還出現金銀平脫工藝。“平脫”或稱“平紋”，是在漆器胎體上貼上剪裁成圖案花紋的金銀箔，然後再塗漆填平，打磨表面，露出圖案。金銀平脫所耗用的金銀數量極其有限，藝術效果却精美異常。

漢代金銀器逐漸凌駕于其他材質的器物之上，生產製造也達到了新的境地。當時“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這一觀念助長了金銀器皿的生產製造。漢代的喪葬玉衣用金綫、銀綫、銅綫連接起來，必須與死者的身份地位相符，使金銀也成為身份、地位的標志。

文獻記載中西漢是個著名的多金王朝，西漢皇帝和國家用于賞賜、饋贈、聘禮、儲存、貿易的黃金數量驚人，見于各種用途的黃金數量，竟達二百餘萬斤。西漢大文豪司馬相如以一篇《長門賦》取悅陳皇后，得黃金百斤，是難以置信的數目。這篇賦僅六百三十三字！但這種現象在東漢時期却悄然失去。人們推測，佛教傳入中國後，塑像塗金、泥金寫經耗費掉了大量黃金，或是絲綢之路開通後，用于購買、交換西域珍寶和賞賜外人而外流，也可能是農民起義時，富豪們把黃金埋藏起來，以後失傳，故出現“西漢巨量黃金消失之謎”的歷史疑問。

目前發掘了數萬座漢墓和多處大型遺址，出土的黃金器物數量仍很少。即便是諸侯、列侯厚葬的大墓中隨葬遺物極為豐富，金銀器也不多。西漢時期製造偽金之風盛行，煉丹方士製造的形形色色的藥金也在社會上流行。或許文獻記載中的西漢巨額黃金未必都是真金，偽金、藥金也被稱之為金。考古發現提供的研究啟示是，漢代鑲金的銅器甚多，是否也被混同其中呢？但西漢將黃金廣泛用于賞賜、饋贈、聘禮等方面，也體現了對黃金的社會意義和價值的認同。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戰亂不絕，官府手工業管理經常失控，金銀器製造的專業技藝走進民間，這一現象是漢代沒有的，文獻記載禁止私造金銀器之事，顯然涉及了流落民間的工匠。晉葛洪《抱朴子·內篇》專門談論到金銀冶煉之術，雖然不免怪异荒誕，却反映當時對金銀冶煉製作方法的多種探索。有關銀礦品位的認識更加提高，《魏書·食貨志》記載，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恒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已經很清楚礦石含銀量的不同和銀礦之間的差別，這是對礦藏品位的最早記載。采礦和組織方式有了新的發展，南朝劉宋時期始興郡存在采銀專業戶，人數很多。還出現黃金與白銀十分明確的換算關係。目前考古發現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金銀器較少，似乎是中國金銀生產和器物製造、使用的相對低潮時期。一方面是因為黃金和白銀產量減少，器物製作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佛教的興盛耗費了大量金銀。雖然金銀器發現不多，但從曹操的《上器物表》、《上雜物疏》中所提到

的各種金銀器物的名稱可知，器物的種類應該比漢代增多，已知的考古發現表明，使用金銀首飾、佩飾已成風尚。

北京市西晉幽州刺史王濬妻華芳墓出土的掐絲鑲嵌銀鈴，頂部為卧獸馱環，銀鈴上半部用掐絲工藝做出手持樂器的八個樂人，每個樂人下懸挂一個小銀鈴。銀鈴上鑲嵌紅、藍寶石，工藝十分複雜。湖南安鄉縣南禪灣西晉劉弘墓和山西省太原北齊婁叡墓的龍紋金帶扣、金飾是用金片壓印、鏤刻成型，金飾工藝更趨于華麗，并與鑲嵌寶石結合。金飾工藝與其他工藝結合，出現了戣金，東吳朱然墓的戣金漆盒蓋，是用真金粉末堆入錐刻或針劃的漆器花紋內，取得光輝耀目畫面的一種髹漆技法。湖北鄂城孫吳初期105號墓的金絲片平貼流雲紋的銀唾壺，是少見的容器。目前較多的發現是在北方地區，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朝陽王子墳山、朝陽田草溝等出土許多金銀首飾和服飾，大都是用錘鍤、鏤刻、鉚釘、鑲嵌技法製成。內蒙古科爾沁左旗、達茂旗出土的鑄造的怪獸、錘鍤的步搖飾件等，形態奇特生動，這些器物都具有濃厚的鮮卑文化的特徵。

南北朝時期發現的金銀器有一個特點，就是中國以西的國家各地區輸入品較多。儘管在漢代已發現如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銀盒、山東淄博市西漢齊王墓隨葬坑出土的銀盒等外來器物，但南北朝時期外國輸入的器物明顯增多，主要有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的銀盤、北魏墓的銀碗、北魏城址的銀長杯和銀碗，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的鎏金銀壺，廣東遂溪縣南朝窖藏的銀碗，這些都是來自西亞或中亞的遺物。出土地點表明這些銀器是經海上和陸上兩種途徑輸入的。西亞、中亞等地的銀器極少有明確紀年，可以肯定出土地點的也不多。中國這批器物出于墓葬、遺址、窖藏中，據墓志記載或遺址、窖藏中的環境及伴出遺物來研判，許多器物的存世年代的下限十分清楚，這對於研究西方銀器也是重要發現。這些外來器物均採用錘鍤技術製作，器表多形成浮雕式的紋樣，其技術為中國金銀器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隋唐五代，金銀器製作發生深刻改變，在世界各種文化中獨樹一幟。隋代重要的發現在李靜訓墓中^①，有金高足杯、銀高足杯、銀碗、銀盒、銀盤、銀勺、銀筷和金項鏈、金手鐲、金指套等。其中金、銀高足杯的形制不是中國傳統器物的造型，即便不是外來物品，也是仿造品。金項鏈和金手鐲可能是西亞或中亞輸入的產品。唐代的陝西西安何家村、江蘇丹徒丁卯橋、陝西扶風法門寺有三次成批的大發現，此外，西安和平門外唐代居住址、陝西銅川市耀州區柳林背陰村窖藏、西安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內蒙古喀喇沁旗哈達溝門窖藏也是較重要的發現。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的金銀器發現較多，浙江臨安板橋吳越墓中隨葬銀盃、盤、壺、大碗、盒、小盃、匙、箸等十七件^②。雷峰塔地宮的金銀器^③有銀臂釧、銀腰帶、鎏金鏤空銀墊、

鎏金銀盒、銀阿育王塔、塔內藏金棺、圓形鏤空銀飾件、鴛鴦紋銀飾，這些金銀器多採用錘鏢、鏤空、鑿刻、焊接、鎏金等工藝製作而成。四川成都前蜀王建永陵也出土了金銀器。五代十國實物資料並不豐富，從風格上來說應與晚唐有承繼關係。

唐代金銀器數量大增，其原因主要是：一，金銀礦的廣泛開採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二，中央、地方甚至私人作坊齊頭並進，產生大批優秀的工匠，特別是官府作坊集中了各地能工巧匠，並有嚴格的生產管理監督機制，使器物製作日益精良。三，試圖邀功取寵的大臣也利用體積輕巧、價格昂貴的金銀器作為進奉物，目前所見帶文字刻銘的器物多是地方官進奉到皇室或中央政府的。皇室貴族的喜愛促進了金銀器的生產，助長了地方官員進奉之風的盛行。四，西方銀器繼續向中國輸入，內蒙古李家營子、西安沙坡村、西安何家村等遺迹都發現有西方，特別是粟特遺物或仿製品。“絲綢之路”傳入的外來文化孕育出了突破傳統的新機遇，外來器物的涌入給金銀器的生產帶來了新的工藝、形制、裝飾風格，因此中國金銀器發展史上出現了重大變革，開創了中國金銀器的嶄新風貌。

隋唐五代的金銀器可分為八世紀中葉以前、八世紀中葉至八世紀末、九世紀至十世紀中葉三個發展演變時期。

八世紀中葉以前是飛速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器類有：高足杯、帶把杯、分曲在五曲以上的多曲長杯和折腹碗，蛤形盒也常見，還有壺、鍋、鑊、瓶等。其中高足杯、帶把杯、多曲長杯等器物在中國傳統器形中不見。盤、盒類的器物以圓形為主，也有一些呈菱花形，少量為葵花形。壺類多帶三足。紋樣盛行忍冬紋、纏枝紋、葡萄紋、聯珠紋、繩索紋邊。花紋纖細茂密，多用滿地裝飾的手法。流行珍珠地紋，即在器物表面用圓鑿刀鑿出細密的小圓圈，排列整齊，作為主題紋樣的底襯。還流行寶相花、捲雲紋、雲曲紋等，這類紋樣多與器物的形制有關，即紋樣的樣式與器體造型相適應，寶相花一般裝飾在圓形器物如盒、碗、盤等上，捲雲紋和雲曲紋多作為邊飾使用。器物的體積小，但比較厚重。絕大多數器物採用錘鏢技術製成，器表先錘出凸凹變化的紋樣輪廓，再鑿刻紋樣，紋樣鑿痕粗深，清晰而連續。許多銀器通體鎏金。

八世紀中葉至八世紀末是唐代金銀器製造的成熟階段，基本擺脫了外來文化的直接影響，完成了金銀器的中國化進程。這個階段高足杯、帶把杯及五曲以上的多曲長杯極少見到。新出現了各式壺，流行葵花形的盤、盒，器皿的平面多作四五曲花形。忍冬紋、葡萄紋、三角紋、繩索紋、捲雲紋、雲曲紋基本消失，寶相花紋仍可以見到，折枝紋、團花紋興起。紋樣更為寫實，分單元布局，留出較多的空白，顯得疏朗大方。少數器物上雖然尚殘留與西方金銀器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直接來自

西方金銀器的影響，繼承的是前期器物的特點，並有所發展。器物的形制和紋樣多是既不見于西方器物、也少見于中國傳統器物的創新作品。

九世紀是金銀器製造多樣化階段。這一階段器物種類大增，目前所知唐代金銀器中的茶具、香寶子、羹碗子、波羅子、蒲藍、溫器、籌筒、龜盒、支架等器類均屬這一時期的產品。唐代自始至終都有的碗、盒、盤的形制發生了大的變化，流行花口淺腹斜壁碗、四五曲花形帶足的盒、葵花形的盤等。折枝紋、團花紋繼續流行，並更加豐富多采。折枝紋種類繁多，並以闊葉大花為特點。鴛鴦、鸚鵡、鴻雁、雙魚等成為人們喜愛的動物題材，出現荷葉、綬帶紋，葉瓣紋、小花紋、半花紋為主要邊飾紋樣。紋樣風格自由隨意，具有濃厚的民間生活氣息。珍珠地小而淺，也比較稀疏。雖然大型器物較多，但有些器物較輕薄粗糙。鑿刻的紋樣輕淺斷續。刻銘器物增多。

在金銀製作工藝取得的卓越成就中，錘鏤、鑿刻技術的成熟和廣泛利用是重要特徵。錘鏤技術是利用金銀板片質地較柔軟的特點，通過錘擊按設計延展，形成需要的形狀。一些形體簡單、較淺的器皿可以直接錘製出來。較複雜的器物分別錘製，再焊接成器，器皿中的碗、盤、碟、杯等大多採用這種方法製造。錘鏤技術還用以製作裝飾花紋，如何家村的蓮瓣紋弧腹金碗，先錘製出器物的基本形態，然後由內向外錘出雙層蓮瓣紋輪廓，蓮瓣由碗內壁向外壁微微突出，形成內凹外凸的效果，再在外凸的蓮瓣輪廓上鑿刻花紋。有時錘製時按底模成型，使紋樣更為準確。錘鏤技術使金銀器皿擺脫了平板單調的表現形式，形制更為隨意，紋樣形成了浮雕風格。鑿刻是在器物成型之後的進一步加工技術，多用於花紋的製作。在金銀器製作有了錘鏤技術後，鑿刻一直作為細部加工手段而使用在器物的表面刻劃上。唐代金銀器上流行的珍珠地紋是在器物表面用圓鑿刀鑿出細密的小圓圈，使器表面更為斑斕，以反映光芒四射的質感。還有一種特殊的鑿刻稱為鏤空，即鑿刻成透孔的紋樣，也稱為透雕，唐代的銀香囊就是以這種工藝製成的。香囊的用途為熏香，需要將香氣散發出來，便將外壁設計的花紋中不需要的部分去掉。

鎏金銀器的真正興盛也是在唐代，當時叫作“金塗”，或稱“金花”、“鍍金”、“金鍍”。掐絲、焊綴金銀珠、鑲嵌工藝在隋唐五代繼續流行，而且製作更加精美。李靜訓墓出土的闊額釵，何家村的團花紋帶把金杯，在光滑的表面上，焊綴以金絲構成的花朵，紋樣突出于器表，富有立體感，在金絲構成的花朵邊緣再焊細密排列的金珠，花朵中原來鑲嵌着寶石、珍珠等。掐絲編織器物有玲瓏剔透之美，法門寺金銀絲籠是用細細的金絲編織而成，為唐代掐絲、金銀織工藝的精品。唐代金銀器製作也採用了鉚接、焊接、切削等工藝。